

Wenhua zhexue lunao

霍桂桓◎著



文化哲学论稿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A dark-colored fountain pen with a silver-colored clip and nib, positioned diagonally across the English title tex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丛书

文化哲学论稿

霍桂桓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哲学论稿 / 霍桂桓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004-6537-9

I. 文… II. 霍… III. 文化哲学-文集 IV. G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3981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93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霍桂桓：男，1963年3月生，河北深州市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世界哲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第三届全国理事会理事，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职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目前主要研究文化哲学、社会哲学、实践哲学、美学、西方美学史。

策划编辑:冯春风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张世英 李景源

主 编：丘 进

副主编：李建群 霍桂桓 张再林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立群	丘 进	刘永富	邬 焜
张再林	张祥龙	李 河	李建群
李鹏程	邹广文	黄万盛	鉴传今
霍桂桓			

总 序

在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在国内外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下，“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丛书”即将面世，真是可喜可贺！

隶属于西安交通大学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是作为我校“985 工程项目”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美国波士顿哈佛—燕京学社合作而在一年前创办起来的；其基本宗旨是，立足于西部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和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名校的基本要求，面向哲学研究之重心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逐步走向文化研究的基本趋势，努力通过与国内外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 and 著名专家学者日益紧密的合作和深入的学术交流，搭建一个既具有西部文化研究特色、又具有国内一流学术水平的、对国内外学者开放的合作性学术研究平台，从而既能够为进一步提高我校的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水平，培养越来越多具有深厚人文修养的高科技人才，因而通过提高我校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而尽快跻身于世界名校之林服务，同时也能够通过积极进取和扎扎实实的、富有西部文化特色的学术研究，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迅速而又健康的发展，做出自己富有建设性意义的重大贡献。

成立一年多来，“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的诸位同仁在继续做好原来的各项工作的同时，积极开拓进取，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通过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加盟而完成了研究所的机构设置和科研规划，使之初具规模，规划并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和合作研究项目、开设了各种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召开了高水平的国际和国内文化哲学学术会议，而且还以这些工作为基础，积极筹备、主持和编辑出版代表该研究所学术水平和研究风格的“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丛书”系列，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大力支持下，即将把这项既宏伟又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才能加以完成的科研规划落到实处。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足以让该研究所的主管领导感到欣慰、让周围的师生感到振奋，并必将引起国内其他同行的广泛关注。

不仅如此，就其第一辑所收录的作品而言，“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丛书”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该研究所的上述研究宗旨和目标：李建群教授的《全球化视域下的长安文化学研究》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古都长安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氛围，力图通过对“长安文化”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历史变迁和当代风貌进行的系统细致的探讨和研究，研究和建立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学理论体系；张再林教授的著作《身体哲学视域下的中国文化重新解读》，力图从作者近年来着重研究的身体哲学角度出发，基于其具有独创性和中国特色的“中国身体哲学”研究视角，利用生成性谱系的研究方法重新解读中国文化，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学术含量甚高的力作。霍桂桓教授的《文化哲学论稿》由作者近年来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十六篇论文构成，它们勾勒了作者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理探索的足迹，特别是对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文化的层次与人生境界的关系、文化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以及文化哲学在马克思哲学理论领域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都展示了作者不拘常说和艰苦探索的研究风格。

可见,“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丛书”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令人欣喜的开端!我衷心希望作为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它能够在该研究所诸位同仁之大量心血和汗水的灌溉下,在国内外学术界广大同仁以各种方式进行的关注、关心、关怀,以及大力扶持和参与下,不断茁壮成长、日益欣欣向荣,为使“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早日真正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高水平开放学术平台,为推进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越来越多的积极贡献!

是所望焉,谨序。

丘 进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8月18日于西安交通大学

自序

走上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之路的缘由

在学术界的不少朋友、在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诸位同仁，特别是在该研究所所长李建群教授和常务副所长张再林教授的一再督促下，我终于改变了在 60 岁正式退休之前不出版自己的任何文集的决定，把自己近几年来撰写的十六篇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的拙文，重新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整理和修改，使之变为相应的十四章和两个附录，并且通过分为上下编而以学术专著的形式，作为“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丛书”的一分子，以《文化哲学论稿》的题目面世，从而既对自己七年来已经走过的一段学术探索道路进行一番初步的概略性清理，也希望此举能够便于广大学术界同道更加集中地对其中的各种观点加以反思和批判。也正是出于这两个基本目的，本“自序”主要试图尽可能简略地交代一些相关背景，特别是交代一下我自己的基本思路的演变过程，以使这两个基本目的能够比较圆满地实现。

一 走上文化哲学的探索道路的简要缘由

所谓“对自己已经走过的一段学术探索道路概略地进行一番清理”，是因为在 2000 年 8 月底到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暨文化研究中心的“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工作之前，我

并没有对文化和文化哲学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探讨和研究，而是主要从事美学，特别是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1993年，我通过调动工作离开了已经工作了五年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北京气象学院社科系，开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并于1993—2000年间在该研究室工作了七年。因此，尽管在大学本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攻读硕士期间学的是美学，特别是美学史和现代西方美学，并且在这些方面都分别下过一番比较苦的功夫，但是，在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理论研究室工作的这七年时间里，通过对现代西方主要社会理论流派的比较系统的学习、探讨和研究，我自己的主要兴趣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方面，认为只有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根本性突破，才有可能在哲学研究的其他所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学习和研究这些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些理论从实质内容上来看分成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个研究取向截然不同的派别，而造成这种分裂对峙局面的根本原因，则可能是在西方学术传统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惟理智主义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也就是说，研究者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把能够卓有成效地探讨和研究没有生命的自然对象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直接搬运到社会领域和人文领域，本身便有可能造成各种各样的偏差。在我看来，其中最主要的偏差就是，研究者无论集中注意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还是作为“个体”的“个人”，基本上都是通过将其被研究对象抽象化和形式化而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因此，本来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社会”变成了硬邦邦的、固定的“（社会）事实”，而“个体”则因此而变成了没有任何生命、情感、欲望，甚至性别的“单子”（或者可以说是“X光照片”；即使诸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著名学者引进了

“主观意义及其理解”，实际上也仍然饱受其研究结论究竟是否具有“客观性”的困扰)。这样一来，究竟如何才能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和层次上把“社会”和“个体”真正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哲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就成了我这段时间集中思考的关键性问题。

正是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我立足于大量翻译和出版相关的、包括单篇文章和经典著作在内的各种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经典性文献，试图通过逐渐消化吸收各个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在现象学社会学、常人互动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符号互动论、知识社会学等重要研究领域，开展当时就国内学术界而言具有一定开拓性的探讨和研究。经过近七年的艰苦探索，我为自己确定了两个基本研究方向：

其一是尽可能系统地批判、反思和清理西方传统惟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特别是系统地批判反思和清理其在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优点和缺陷；

其二是在尽可能充分地吸收和消化包括现代西方思想家在内的所有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打破与这种惟理智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念的王国”(the kingdom of conceptions)的种种束缚，力求把自己的学术探讨和研究的目光紧紧盯在人们实际进行的、现实存在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活动之上，而把所有前人的研究成果都当作可供参考和批判扬弃的材料来加以对待。

在这种基本倾向的支配下，经过一番异常艰辛的思考过程，我开始逐步形成我自己今天所谓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总体性基本思路的萌芽，并且开始了逐步完善的过程。其基本倾向是，在批判地吸收和扬弃自己以往涉及到的所有各种学术资源的基础上，从根本上确定不仅“社会”是不断生成的，而且“个

体”也同样是不断生成的——“社会”在“个体”的生成过程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其施加程度不同的“塑造作用”；而“个体”则在其生成过程中出于其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而对“社会”进行一定的建构和解构作用；而且从根本上说，“社会”和“个体”进行的这两种相互生成过程，都是以具体的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互动过程（social interactions）为基本前提、现实基础和实际母体的。显然，这样一来，由于包括任何一位学术研究者在内的所有各种“个体”，无一不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环境之中的“社会个体”，无一不通过各种特定的社会互动过程而经历其特定的生成过程，无一不由于这样的生成过程而逐步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所以，无论一般说来的普通人在其一生之中进行的各种行为举止及其结果，还是由于“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业绩而彪炳史册的、所有各个方面的杰出人物及其具体成就，也都无一不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过程，以其特定的生成过程为基础，作为其特定的人生境界的某种表现而产生出来，并且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发挥其作用的。

这样一来，对于我自己来说，“社会个体生成论”便不仅仅涉及某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者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而是作为一个发挥总揽全局之作用的、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基本思路而存在着——也就是说，从这种基本思路的形成之日起，我便开始尝试把自己以往进行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美学原理研究、西方美学史和现代西方美学研究、现象学美学和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符号互动论研究、常人互动方法论研究、知识社会学研究乃至翻译理论研究等等所有各个方面的思考，都纳入到这个基本思路的统领之下。尽管这样做究竟能够走多远尚不得而知，但自己在这样的学术探讨和研究过程中，确实逐渐开始觉得有了久违的“豁然开朗”之感。毋庸赘言，我从事文化和文化哲学方

面的探讨和研究所依据的也是这样一种基本思路。

说到进行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这实际上是一件原来根本没有料到，但事到临头却于情于理都难以推却的事情：2000年上半年，我因为某些个人的原因打算离开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理论研究室，前往向往已久的哲学研究所工作，希望此举既使自己在心理上和实际研究方面都能够彻底“归队”，也因此而能够以比较单纯的状态继续进行上述已经酝酿数年的社会哲学研究，至少希望这种总体性研究能够先在现象学社会哲学研究、符号互动论社会哲学研究，或者知识社会学研究之中的某一个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以“回应”一些老朋友、老同学关于我“总是不写东西”的“指责”，报答他们的殷切希望。

但始料不及的是，我正式调到哲学研究所工作之后，恰好赶上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挂靠在哲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是便在老同学张晓明研究员的“催逼式”盛情邀请下加盟其中，并且由此而承担了“从事文化哲学理论研究，负责进行基础学科建设”的任务。显然，对于任何一个认真从事严格的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都意味着暂时放弃已经准备多年的原有研究项目，在几乎没有任何先期准备的情况下开始执行一项崭新的研究任务。盛情难却，我只好暂时放下已经差不多快要“瓜熟蒂落”的社会哲学研究，几乎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尽快转移到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上来。

不过，接下来在哲学研究所的实际工作历程表明，我始料不及的尚不仅仅是不得不尽快放下自己的社会哲学研究而转向文化哲学研究，而且还有更加棘手、更让我不知所措但又不得不全力投入其中的工作安排——由于《世界哲学》（原《哲学译丛》）主编李河研究员即将作为高级访问学者，于2001年秋季赴美国波士顿的哈佛—燕京学社进行访学和研究工作，所领导考虑到我曾经做过多年的翻译和杂志编辑工作（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期

间,我一直兼职做《国外社会学》的编辑工作)、主编过几套大型翻译丛书^①,并且与国内学术界不少朋友有比较密切的学术联系,于是便决定在李河主编赴美期间,由我作为该杂志代理主编主持全面工作。这样一干就是近三年,我几乎把3/4以上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与编辑部改革有关的各种事情,特别是由《哲学译丛》改刊为《世界哲学》和进一步建立广泛的国内外学术网络的工作之中了。这样一来,原来本应当全力以赴的“主业”即文化哲学研究,反倒变成了被暂时搁置、实在迫不得已^②才“介入”一下的“副业”了。

不过,尽管起步甚晚、“命蹇时乖”,我的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总算是以“蹒跚踟蹰”的方式开始了。本书上编各章所记录的,便是不断进行这些探索、不断走向成熟的足迹。

二 初步进行文化哲学探索的两个阶段

我之所以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决心在60岁正式退休之前不出版自己的文集,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毋庸讳言,国内不少研究者出版的论文结集质量不高、水分颇多,常常是其中只有少数几篇可读或者在读后有所收益,其他篇章多为凑数之用,因此,特别是在求学期间可用于购书的款项非常拮据,所以我一直对各种文集不感兴趣。

① 这几套丛书分别是:1998—2001年,与北京的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共出版三辑,44种经典性翻译著作;2000—2002年,与北京的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知识与社会译丛》,共出版8种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经典性著作;2000—2003年,与北京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西方思想经典文库》,共出版两辑,共15种经典性著作。

② 这里所谓“实在不得已”,是指为了应邀参加国内外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而不得不撰写和提交“急就章”式的会议论文。

其次，与这样的论文集相比，中西方思想史上的著名思想家们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成名作，自然显得学术含量颇巨，因而在购书款项拮据、藏书空间稀缺的情况下，选择它们而不是选择论文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后，由于当今电脑网络的迅速发展和高度发达，许多文章都可以在主要学术网站的网页上找到、阅读。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读者显然没有必要非购买本来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阅读和参考的各种论文不可。这样一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不少读者也就有理由不愿意购买各种论文集了。

那么，我自己为什么又要把自己的论文整理成为学术专著而加以出版呢？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包括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所的诸位同仁在内的不少学术界友人的盛情催促之外，我之所以改变上述初衷，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我看来，本书收集和修订整理的拙文都不是信手拈来的应景之作，而是既凝聚了我自己探索和尝试解答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诸方面问题的汗水和心血，同时也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始终贯穿着运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来进行文化和文化哲学方面的探讨和研究的一条主线，尽管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急就章”的色彩。因此，与那些动辄洋洋数十万言，而真正具有自己的独创性观点的“干货”却没有几句的“鸿篇巨制”相比，这些重新以章节的形式出现的拙文或许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不仅如此，对于从事严格的学术研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我认为，那些出自名家之手、系统全面和详尽的鸿篇巨制，固然因为其丰富的学术含金量而非常可贵，但它们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那就是它们所展示的都是已经彻底完成的、具有某些封闭性体系色彩的研究成果，因而往往并没有把作者艰苦的探索过程、逐步形成这些成果的过程比较充分地展现出来——在这种情

况下，读者往往容易直接接受其研究结论，而对于这些研究结论的产生方式、生成过程，特别是经由这些过程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基本思路及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则不甚了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角度来看，读者往往得到的是作为研究结果而存在的“黄金”，而几乎不可能进而学习和把握作者所使用的“点金术”。毋庸赘言，“黄金”固然可贵，而对于有志于通过自己的开拓性学术探讨和研究超越前人、做出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贡献的人来说，更加可贵的显然是“点金术”而不仅仅是“黄金”。另外，尽管本书所收集的不少拙文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但颇为分散，用来阅读尚可，用来进行批判性引用则稍嫌不足，因为网络读物是很难按照现行的学术规范标注引文出处的。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把自己自 2000 年开始进行文化 and 文化哲学探讨和研究以来撰写的 16 篇拙文重新整理，以章节的形式做成一部专著，以供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大同道进行阅读和批判之用。

具体说来，以 2003 年为界，这些拙文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形式上即为上下两编：“上编：全球化视域中的文化和文化哲学”由 2003 年之前的论文组成，亦即本书的第一章至第六章（从时间角度来看，还应当包括附录“一”），它们主要围绕着“经济全球化”和所谓“文化全球化”撰写，虽然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问题、文化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对文化哲学的初步探讨，并且试图结合诸如现象学这样的在 20 世纪西方哲学中影响很广的学术流派来进行相关论述，但是总的说来，我在这个阶段的探讨和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非常稚嫩，基本上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之上。尽管也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有意义、值得进一步加以详细探讨